

「鑑古——乾隆朝的宮廷銅器收藏」 特展介紹

■ 張莅

乾隆皇帝（1736-1795 在位）擁有許多古代的銅器，和其他珍貴收藏一樣，這些銅器布置於各個宮殿，是清宮日常生活中的景致。特別的是，乾隆皇帝曾召集群臣，為銅器丈量尺寸、手繪圖像、撰寫說明。他在位的六十年間，持續整理和編輯，完成了三套宮廷收藏銅器的圖錄。在尚未有照相技術的時代，這項耗費人力的編書工程，為清宮裡大量的銅器留下形影紀錄，成為最具規模的官方圖鑑。

現在，打開乾隆朝的銅器圖錄，看見的是當時探尋古史的一種方法。由於對夏、商、周三代的未知和想像，有著神秘紋飾和古文字的銅器，成為古人追尋、理解和鑑賞的對象。本展覽分為「鑑古遠思——乾隆皇帝與古銅器」、「精繪形模——銅器的分類和記錄」、「學古有獲——銅器組合的理解與再現」三個單元，從清宮舊藏的銅器和分類繪製的圖錄，展現乾隆朝對於歷史文物的思考，並反映鑑賞過程中的知識轉變。

乾隆皇帝與古銅器

坐擁清宮裡收藏的古銅器，乾隆皇帝曾經為個別銅器寫下詩文作品，文中可見歷史情懷以及儒學智識。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在位時，曾召集群臣，參考宋徽宗敕編的《宣和博古圖》（1123），以手繪和摹寫的方式，將大量的銅器實體，轉化編成一冊又一冊的圖錄。由書中所載器物，可見當時銅器藏品的豐富類型，器物年代由商、周迄及漢、唐，除了中原樣式，也包括來自邊疆、異域的銅器。

一、以詩相配

乾隆皇帝寫作的銅器詠物詩，多感興於歷史典故或儒家經文，並且將詩作泥金刻題於精工製作的木質臺座上，與之相配收藏。如院藏商晚期〈亞旒觚〉配有木籀與臺座（圖1），籀上可見乾隆三十五年（1770）所作的

五言詩：「生綠重重蔚，深紅點點塗。立旂銘可辨，執木器斯殊。於古誠無二，匪今始不觚。睪然發遐想，東序伴河圖。」臺座上題「乾隆御賞」款，底有器名「周亞觚一」詩中由銅器鑄色引發古物感興，並回應《論語·雍也》中的「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以及《尚書·顧命》當中的「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展現乾隆皇帝對於銅器的理解和鑑賞，出自於儒家經典的詮釋脈絡。另如院藏商末周初〈三孔卷雲狹刃半圓形管鑿鉞〉、春秋晚期〈邾大宰鐘〉皆配作專屬的紫檀木架，後者除見皇帝詩題，亦錄有群臣的詠頌，為宮廷圍繞古銅器之唱和，留下珍貴紀錄。

特別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並為之題詩至少七首以上的，是一套江西出土的古鐘。

乾隆二十四年（1759），江西巡撫阿思哈上奏「新喻縣北鄉民人符姓家，掘地獲古鐘大小十一口，古色斑斕，似非近代之物，鐘面篆文，不能辨識，或係朝廟樂器，民間不便收藏，合行恭進，得上覽。」（圖2）當時適逢平定回部，因此視為祥瑞之徵。清高宗將十一件古鐘視為一套，另補鑄大呂一件，以合於古代十二律，並相配古律名之。現此套銅鐘僅存四件，包括國立故宮博物院兩件，北京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各一件。本院所藏為相配律名「仲呂」及「蕤賓」者。（圖3）

進入清宮的十一件古鐘，存放於特別設立的韻古堂，並收錄於《西清續鑑·甲編》，



圖1 商晚期 亞旋觚 附清代乾隆時期木箱與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下 卷597頁2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名為〈周罇鐘〉。據書中的器物圖繪和文字記錄，十一件鐘的形制、紋飾皆相同，尺寸由大至小排列。銘文內容大致相同，各自成篇。依字數多寡，分為全文和簡要版兩種。由銘文第二句可知，器主「者減」是春秋晚期吳王「皮難」之子，兩人名號皆為記音形式，故現將此鐘進一步定名為春秋晚期〈者減鐘〉。鐘銘內容主要為祈福語和形容此器的樂音悠揚美妙。此套編鐘為目前所知春秋時期吳國較早的帶銘青銅器，銘文有吳王和其子之名，說明此器來自吳國的高級貴族，反映了吳國禮樂文化及漢字在長江下游的發展。

乾隆皇帝曾數度詠詩，反覆回憶此事，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仍可見詩作如：「西

江獻古鐘，闕者為之補。律呂十二全，金聲玉振舉。因就斯舊堂，數典稱韻古。即境偶思之，樂云詎鐘鼓。峯想三代風，斯民那能覩。」可見此器在他心中的重要性和象徵意義。另一方面，《皇朝禮器圖式》中和韶樂所用之編鐘，即據此組編鐘形制設計，可見其對乾隆朝樂器改革的重要影響。

二、三代以外

在乾隆時期的清宮之中，銅器的收藏主體除了所謂的「三代青綠」之外，亦兼及漢唐時器。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部分的漢唐銅器反映著中古時期的政權和文化因素，如院藏北魏〈神獸蓮花紋壺〉（圖4）為北燕系工匠在平城的作品，此腹壁由上至下共三層紋



圖3 春秋晚期 者減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飾，分別為雲氣紋、神獸紋、蓮瓣紋。神獸紋之中，可見有人面鳥身像、龍和鳳鳥等。器外底的雙層蓮花瓣，相連排比，形成底座襯托的效果。紋飾風格融合三燕和北魏因素，推測年代約為五世紀中葉。¹

乾隆時期最具有時代收藏特色的，莫過於來自清帝國西部和西南方的銅器，類型含括容器、兵器、樂器、印章、錢幣。有別傳統銅器的漢字文化及紋飾藝術，呈現異域的風格特色。這些銅器被納入龐大的宮廷收藏之內，進行編目及考究，成為乾隆皇帝對其帝國武功的文化展示。

透過對這些三代以外的銅器考察探索，也可見乾隆時期關於邊境、國族和多元文化的想像。如院藏一件伊斯蘭銅容器（圖5），曾引起乾隆皇帝的興趣，時值回部戰事，他

遙想避暑山莊中的這件舊藏器「似豆而短足，初以為三代青綠耳，迫視之，形不饜饜，銘不乙丁，金銀錯其文，則似回字，令吐魯番、哈密回子等識之，惟識噶愛兩字，其餘皆不辨」指出此器與銅豆的形制殊異之處，紋飾和銘文也非三代銅器樣式。乾隆皇帝因此找來回人協助辨認，卻僅識得兩字。（圖6）

現觀察此器為圓口、細短柄、盤形圈足。器腹可見波浪式的聯珠紋帶交會，間隔填滿花葉紋，圖塊以銀片鑲嵌。口緣及圈足上各有一周庫發體（Kufic）銘文，是伊斯蘭文化中常用於抄寫可蘭經的古體文。銘文內容為向真主阿拉祈求人世名利的祝願之語。經比對，此器可能來自伊朗東部呼羅珊，年代約為十三世紀。²雖然乾隆時期釋文未果，但藉由考述回鶻國的地域、文化，以及和中國交



圖4 | 北魏 神獸蓮花紋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 13世紀 伊斯蘭回文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流的始末，並將此回文器年代訂為唐，仍可見其詮釋器物時的考證精神。

另外，乾隆時期於烏魯木齊屯田墾地出土的一方銅印，也曾獲得關注。此印為方形，板狀，槓鈕，印面作陽文，篆體六字：「錢引庫檢察印」（圖7）並配有素淨的木方盒，盒內另裝盛呈文一紙，內容考訂該印源流。據考，《宋史·食貨志》載北宋崇寧以前使用「錢引」紙幣，對照〈職官志〉說明交引庫負責給印出納，以及左藏庫設有「提轄檢察官」可知此印是用於錢鈔發行的認證。然而，宋代疆域未及烏魯木齊，與歷代官印相比，形制粗率，考訂者認為此印乃西夏學習宋制的遺存。現就此印用朱文、印鈕無穿孔的形式，與西夏官印使用白文，且保留古印鈕穿孔的特色不同。宋制銅印在烏魯木齊出土，或有其他傳世緣由，現已不得而知。

同樣在三代銅禮器範疇之外，乾隆皇帝的南方銅鼓收藏也顯得獨特。明清時期的方志已有不少銅鼓於華南地區出土的紀錄。乾隆皇帝曾作〈銅鼓歌〉，詩中吟詠的銅鼓，為雍正八年（1730）於廣西出土。³ 乾隆三十一年（1766），阿桂舉兵緬甸，途經雲



圖6 | 清 王杰等奉敕編《西清續鑑·甲編》附錄1 唐時回銅器 清乾隆五十八年內府圖繪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大姚縣時，亦在紮營處掘得兩面銅鼓。⁴ 這些於特定區域出土，且具有個別紋飾系統的銅鼓，在清宮的舊藏銅器中自成一類。

原陳設於瀋陽奉天行宮的〈立蛙紋鼓〉（圖8），面徑達77.5公分。鼓身作三段，鼓胸圓突，腰部內縮，圈足外撇，中空無底。鼓面中心飾太陽紋，十二芒，芒體浮突，芒間作翎眼紋。暈圈由內至外可見雲紋、變形羽人紋、變形翔鷺紋、眼紋。鼓面邊緣有四隻立體青蛙塑像，蛙身飾十字紋帶。其中兩蛙間另有一立鳥。鼓身亦滿布紋飾，主要有變形划船紋、複線交叉紋、圓圈紋、水波紋等。根據出土資料，此鼓應屬廣西冷水冲型，年代約為東漢晚期至南朝。



圖7 | 西夏 錢引庫檢察印 附清代呈文及木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 東漢末至六朝 立蛙紋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據《西清古鑑》〈漢銅鼓一〉圖說，考銅鼓多出於兩川、百粵等地，並記載漢代馬援、諸葛亮軍用遺製，及唐代嶺南節度使鄭綰獻於寺廟之說。可見清宮連結出土地域和史事傳說，理解銅鼓與南方地區的民俗器用文化。

三、編書：銅器圖錄

乾隆時期編纂的第一部銅器圖錄為《西清古鑑》（1755），總計四十卷，並附《錢錄》十六卷。（圖9）書前〈上諭〉闡明編書緣由，乾隆皇帝命尚書梁詩正等人，將殿廷陳列和內府儲藏銅器，依《宣和博古圖》形式「精繪形模、備摹款識，為西清古鑑一編，以游藝之餘功，寄鑑古之遠思」歷時兩年編成。第二部為《寧壽鑑古》十六卷（約1781），收錄的銅器為新增入藏品，並且陳設於改建之後的寧壽宮。第三部為《西清續鑑》（1793），繼續收錄入宮的銅器，分為兩部，《甲編》二十卷，收錄紫禁城的藏器；《乙編》二十卷，收錄盛京奉天行宮的藏器。以上圖錄合稱為「西清四鑑」或「乾隆四鑑」，總計收錄4,105件器物，是官方最具規模的銅器圖鑑。



圖9 | 清 梁詩正等奉敕編 《西清古鑑》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銅器的分類和記錄

儒家經典中所述的三代，指的是夏、商、周三朝。宋代開始收集、編書與研究的三代銅器，實際上多為商、周時期所製作。記錄銅器的方式包括丈量尺寸、摹寫或傳拓銘文、描繪圖像。認識銅器的第一步，在於器物專有名稱和形體樣貌的連結，宋代的編書方式，即是按器形的分類作為卷次安排，以達到圖鑑的效果。到了乾隆皇帝的《西清古鑑》時，由名稱來看，書中的銅器已達七十個類別，同時成為其他材質模仿的古器範本。（圖 10、11）

一、銅器的知識建構

三代銅器的出土，一開始來自偶然，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序言中曾指出「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對於從土裡或水中乍現的銅器，兩漢時人已感到陌生和驚奇。據《漢書·郊祀志》記載「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

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縱然李少君的方士形象使得這段史事顯得無稽，參照當時《三禮圖》由禮書文字譯器的方式，都突顯了漢代對於三代銅器知識的斷裂和匱乏。

至宋代，隨著金石學興起，關於銅器的探索才真正進入知識的建構。透過內府和私人藏家的搜羅訪求，宋徽宗朝的《宣和博古圖》，為官方編纂的第一部古銅器圖錄，卷次按器類編排，再以時代區分，有銘者在前，依序著錄每一件器物的時代、名稱、線描圖、銘文和釋文，詳記尺寸、容量和重量，並作考訂。此書圖文並茂的記錄方式，使鑑識銅器有了較多的比對資料，並成為後世編纂銅器圖錄的典範。

西清四鑑基本上雖依《宣和博古圖》體例編纂而成，在具體細節方面仍有些差異，如容庚的觀察，三足鼎的線描圖，原為雙足在前，呈現的是觀看銘文為主的視角，改成



圖10 商晚期 獸面紋貫耳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了單足在前，因此足部作獸面紋飾的器形，獲得正視且五官立體。⁵於銘文方面，雖為摹本，且形態多失之千里，卻仍以黑底白字，達到拓本的效果，頗費周折的表現形式，可見摹篆者追求的金石精神。

除了官方編纂圖譜，民間文人士子亦以編書作為金石職志。經過宋代和清代兩朝的大量著錄和整理，奠定上古銅器的器物知識建構，包括銘文的釋讀、器物名稱和分類的連結、功能用途的考訂，以及禮書內容的對照理解。在今日出土材料蓬勃發展的時刻，過去日積月累的認識成果，無疑仍然是展開研究的基石。

二、銅器的名字

透過銅器的分類和記錄，每一類銅器皆各自擁有專屬名稱，而隨著對於器物認知或銘文隸釋的改變，名字也會跟著變動。因此器名的改易，往往反映著銅器知識史的進程。



圖11 清 竹雕獸面紋貫耳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文人已注意到器形和名稱的對應問題，如歐陽修（1007-1072）於《集古錄》提及蘇軾（1046-1100）的一件新收藏銅器的命名過程：「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為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為『敦』爾。」說明此器與當時分類中的銅敦不同，卻仍依其銘文中的自名作為歸類。

雖然宋人已由禮書之經學脈絡，轉換為金石學的器物考察，⁶僅由銘文作為判斷，在某些器類之中，卻仍存在問題。以銅簋為例，簋類器基本形制為鼓腹、圈足，流行年代為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其間的外貌變化主要表現在耳部和足部。從宋代到乾隆時期的銅器圖錄，簋類器被分置於「敦」、「彝」項下，反映當時對於這一類器物的定名不清。

至清嘉慶年間，金石學家將銅簋銘文中

的自名「𩚑」（𩚑），由「敦」改釋為文獻中的「簋」。⁷清末民初時，則將混於其中的「盨」另立為一類，⁸並區別「彝」為銅禮器的共用名稱，⁹至此才明確簋類器的定義。（圖12、13）

銅器命名的準確，有時還牽涉到器物的完整性與否。如院藏西周中期〈周蓼壺〉（圖14）此器為橢方形體，直頸，鼓腹，圈足外

撇。頸飾左右對稱的回首鳳鳥，腹飾蟬紋十字帶。此器之蓋已失，據《西清古鑑》卷十九頁十一所錄（圖15），器蓋銘文為六行，字數、內容均與器身銘文相同。《西清續鑑·甲編》另錄有同銘之〈周宜尊〉（卷五頁二十二），兩壺原應為一對。

清末民初著名畫家吳昌碩（1844-1927），曾收藏〈周蓼壺〉其中之一的壺蓋全形拓（圖



圖12 | 西周早期 作父己簋 器內底銘文 自名為「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 西周晚期 師爽父簋 器蓋對銘 自名為「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4 | 西周中期 周夔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6)，現藏於本院。據吳氏七十四歲時所作題記，其時對於此器自名為壺，器形卻未與壺相類而感到困惑，於是將銘文中的最後一字釋作「匜」，以作為對此蓋的分類判斷。又此拓為求銘文正行的角度，蓋身倒置，鳳鳥紋飾上下顛倒。然而拓片的留存，卻為失傳的〈周夔壺〉器蓋形影留下珍貴紀錄。

銅器組合的理解與再現

相較於分類概念下的單件銅器，不同器類之間的組合關係，反映的器用脈絡更為完整。從禮器應用的角度，乾隆皇帝曾將古銅器重新選配，作為國子監的孔廟祭器，呈現當時對於周代禮器組合的想像。隨著時空轉換，今日學習銅器知識的目的，脫離經世致用的情境，進入講求論證的歷史研究。由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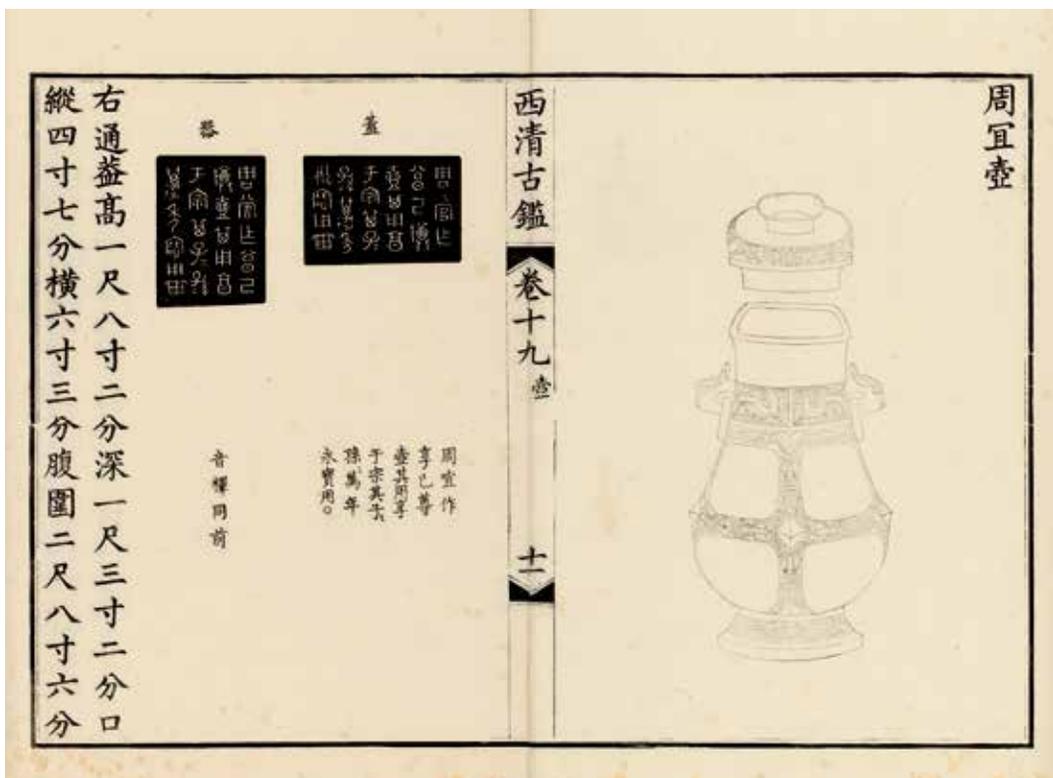


圖 15 | 清 梁詩正等奉敕編 《西清古鑑》 卷19頁11 周宜壺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民國 吳昌碩 周夔壺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器組合探尋作器者的身分和背景，也有了考古資料帶來的地理資訊。以乾隆時期的宮廷銅器收藏為例，透過銘文，可以找到來自相同族氏，甚至是同一位作器者的銅器，藉由出土材料的聯繫，以及科技檢測的幫助，三代銅禮器的更多面向逐漸浮現。

一、乾隆皇帝的銅器組合：國子監周範十器

漢武帝時設立太學，作為傳授經書的最高學府，以培育人才。隋代時，改稱國子監，隸屬於禮部，除了舉辦科舉考試，同時掌管教育行政，督責學子。清康熙朝時，國子監成為獨立單位。乾隆三十三年（1768），命大學士傅恆修葺國子監文廟。隔年落成，擇內府藏周代銅器十件，頒置於文廟大成殿，作禮器用備。乾隆四十四年（1778），錄此十件銅器圖像於書冊，一併存放國子監內。乾隆皇帝於國子監文廟陳列此「周範十器」，以尊孔子從周之志。

現此「周範十器」皆藏於本院，據《欽定國子監志》記載，「周範十器」包括周康侯鼎、周犧尊、周內言卣、周犧首壘、周雷紋壺、周召仲簠、周盟簋、周雷紋觚、周子爵、周素洗。十件銅器的名稱雖皆冠周，以現在的眼光審視，卻有半數為宋以後的仿古器。張臨生已撰文指出只有〈康侯鼎〉、〈犧首壘〉、〈犧尊〉三件為周代銅器，〈子爵〉為商代器物，〈素洗〉為漢器，其餘〈內言卣〉〈雷紋壺〉、〈召仲簠〉、〈盟簋〉、〈雷紋觚〉皆為後人所作。¹⁰以〈周盟簋〉（圖 17）為例，全器作圓角長方形，帶蓋，蓋頂有四個獸形鈕，圈足。蓋頂面紋飾為斜角對稱的兩獸，器身飾竊曲紋及瓦紋，器外底作網格紋。全器形制近於兩周之際流行的「盥」。蓋與內底均有銘文「大師小子師望作彝彝」，明顯仿



圖 17 | 南宋至明 大師望簋、蓋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自《宣和博古圖》的〈周太師望簋〉。雖然《西清古鑑》力圖更新《宣和博古圖》的考訂舊說，但是在器物年代的辨識方面卻顯然深受影響。

二、考古材料視野下的組合之一： 商代晚期亞醜族氏銘文器

「」為商代晚期的族氏銘文，一般讀為「亞醜」。¹¹目前可知的亞醜銘文銅器約有一百餘件，大部分為傳世器，並且多數收錄於乾隆時期的銅器圖錄中。另有十幾件於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此處應為亞醜族氏墓地，其中一號墓是帶有四個墓道的大墓，為安陽殷墟之外的高規格墓葬。經研究，此墓應為亞醜族的首領墓葬，蘇埠屯為該族氏的族墓地，並與薄姑國聯繫。¹²李學勤以甲骨刻辭中的「小



圖 18 | 商晚期 亞醜者姁方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臣醜」之活動記錄，推測商王為防禦東邊的人方，故而命其率領族人前往戍守，¹³是為該族活躍於蘇埠屯地區的前因。其後，陸續有多位學者發表關於此族氏與歷史上的古國對應，透過文獻比對，有夏遺民¹⁴、齊國¹⁵、九侯¹⁶等不同的說法。

目前可見的商代晚期亞醜銅器，大部分皆為僅署族氏名的單字青銅器，當中有一群帶有「〔亞醜〕。者姁以大子尊彝。」的同銘器，包括尊、爵、觥、壺等器類。此群銅器的特色為方形形制，紋飾繁麗。院藏〈亞醜者姁方尊〉（圖 18）為方形器，口部向外高曲度翻折，束頸，斜肩，高足外撇。全器周身有八道扉稜，頸部扉稜向外延伸出口緣邊界。全器以浮凸的獸面紋及夔龍紋為主紋，地紋以細密的雲雷紋為飾，斜肩上另外分鑄八個立體獸首飾件。

值得注意的是，本院另藏有一件〈亞醜方簋〉（圖 19），此器著錄於《西清續鑑·甲編》卷七頁十八，名〈周亞方彝〉。（圖 20）此件方簋經由 X 光攝像，可見器底有三塊銘文拼接覆蓋，最底層為一中間有字的大



圖 19 商晚期 亞醜方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0 清 王杰等奉敕編 《西清續鑑·甲編》卷七頁 18 周亞方彝 清乾隆五十八年內府圖繪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亞形，第二層為殘片，可見「姁以」及「彝」字，最上層的是現肉眼可視的「亞醜」銘文。由銘文經拼接的線索，可知此〈亞醜方簋〉應當與〈亞醜者姁方尊〉屬於同組器物。由者姁作器的規格，可見當時亞醜族氏的地位非比尋常，在商王朝的東方經略中佔有重要位置。

三、考古材料視野下的組合之二：

春秋早期芮公器

芮國為周代姬姓封國，在周康王時，芮伯曾經是重要的輔佐大臣。乾隆時期宮廷收藏的銅器中，依銘文和器物時代特徵，可找到來自春秋早期的一組「芮公」銅器，包括鼎、簋、壺、鐘。（圖 21）於陝西韓城梁帶村發掘的芮桓公墓葬，則為他的後人遺跡。

此次展出的芮公器，皆收錄於《西清古鑑》，可見這組銅器進入清宮的時間較早。隨著陝西韓城梁帶村墓地的發現和公佈，對於芮國的地望，以及春秋早期的芮國史事都有了更近一步的討論。除了銘文揭示傳世芮公器的來源之外，現在透過與出土器物的比對，也可以找到密切的聯繫。如春秋早期〈芮公簋〉紋飾與梁帶村二十七號墓出土的六件銅簋相近，¹⁷並且銘文同樣位於器頂，是少見的鑄銘選擇。又如春秋早期〈芮公壺〉除了銘文也在蓋頂，器腹正中的吐舌狀龍首，且雙尾向兩側展開的紋飾，具有強烈的區域因素，對比秦系和晉系銅器的裝飾影響，展現春秋時期芮國居處於兩股勢力之間的文化風格。

結語

商代和周代製作的銅器，距今約三千年，在漫長的傳世過程中，或經鑑賞考究，載之書冊，或經改製重組，面貌丕變，又或隨著收藏者留有時代的印記。今日，為能更清楚



圖 21 | 春秋早期 芮公器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地認識典藏於博物館的銅器，除了探究原器承載的時空訊息，每一件器物的傳世經歷，亦是關鍵的拼圖，現代科技和數位人文則幫助我們一步一步的重建過去可能發生的故事。

經過時間推移，銅器從歷史現場、宮廷收藏，進入到博物館，一次又一次的註解，記錄著古物，也記錄了時代。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林聖智，〈北魏平城時期的裝飾文化——由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件銅壺談起〉，《故宮學術季刊》，33卷1期（2015秋），頁169-210。
2. 張臨生，〈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伊斯蘭銅器〉，《故宮文物月刊》，102期（1991.9），頁4-15。
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7，乾隆元年正月初八日〈木作〉，頁56。
4. （清）劉榮勳纂，黎恂修，《大姚縣志》（道光25年〔1845〕出版），卷13，頁3。參自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https://reurl.cc/gmoErb>（檢索日期：2020年11月17日）。
5. 容庚，〈清代吉金書籍述評（上）〉，《學術研究》，1962年2期，頁49-50。
6. 許雅惠，〈宋、元《三禮圖》的版面形式與使用——兼論新舊禮器變革〉，《臺大歷史學報》，60期（2017.12），頁57-117。
7. （清）錢坫，〈周平仲簋〉，《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頁67-69。
8. （清）黃紹箕，收入（清）王懿榮輯，《翠墨園語》，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6），冊37，〈考證目錄題跋類〉。
9. （清）王國維，〈說彝〉，出自《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53-155。
10. 張臨生，〈真厲相參的國子監周笏十器〉，《故宮文物月刊》，73期（1989.4），頁34-55。
11. 關於此族氏銘文的隸釋，尚未有定論，為說明方便，展覽沿用舊稱。
12. 殷之彝，〈山東益都蘇埠屯墓地和「亞醜」銅器〉，《考古學報》，1977年2期，頁23-27；顧頡剛遺著，〈奄和薄姑的南遷〉，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文史·第三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1-16。
13. 李學勤，〈考古發現與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3期，頁253-357。相關論說又見於氏著，《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頁253-257、241；氏著，〈帝辛征夷方卜辭的擴大〉，《中國史研究》，2008年1期，頁15-20。
14. 杜在忠，〈關於夏代早期活動的初步分析〉，《夏史論叢》（山東：齊魯書社，1985），頁245-265；王樹民，〈亞醜推論〉，《東夷古國史研究·第二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頁76-99。
15. 李零，〈蘇埠屯的「亞齊」銅器〉，《文物天地》，1992年6期，頁42-45；李海榮，〈亞（西皿婁）銘銅器研究〉，《遼海文物學刊》，1995年1期，頁35-48、53；（日）黃川田修著，藍秋霞譯，許宏校〈齊國始封地考——山東蘇埠屯遺址的性質〉（原發表於日本《東洋學報》第86卷第1號），《文物春秋》，2005年4期，頁69-78。
16. 王恩田，〈益都蘇埠屯亞醜族商代大墓的幾點思考〉，出自陳光祖編，《金玉交輝——商周考古、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頁23-39。
17.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編，《金玉華年——陝西韓城出土周代芮國文物珍品》（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頁84-87。